

崔兆森和他的家庭博物馆——

# 一个家庭的时代记忆

□ 本报记者 赵国陆

73岁的崔兆森喜欢收藏，在济南办了首个家庭博物馆，留存展示一家三代人的老物件。14000多件藏品，1500多万字日记，记录了我们身边的生活变迁，留住了一个家庭的时代记忆。初秋时节，在济南市春元里小区一处安静的民房里，满头银发的崔兆森身穿一套古朴素装，像往常一样坐在桌子前写日记。每当有访客到来，他总是热情地接待，如数家珍般介绍自己的家庭博物馆。那些琳琅满目的老物件，仿佛带你穿越了时光，昨日重现。

## 留下“念想”

“这个带铜子的碗我小时候用过，这是母亲当年做针线活的筐，这是1992年花了接近4万元买的‘大哥大’……”崔兆森的藏品并非文玩古董，全都是寻常人家用过的生活物品，在有些人眼里甚至可能是废品。小到糖纸、信件、杂志、皇历、课本、票据、算盘，大到缝纫机、自行车、电视机、电冰箱等等。每个老物件背后都有一个鲜活的故事，都能讲出一段过往的回忆。

但凡参观过这个家庭博物馆的人，无不佩服崔兆森是个“有心人”。说起收藏老物件的初衷，崔兆森说，最初想为家庭留下一份纪念。收集多了发现，这些生活中的“念想”、老物件，见证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老百姓日新月异的生活变迁，也像一个个路标，让人们看见来路，有迹可循，也清楚未来如何走下去。

他幼年受母亲的影响，年轻时第一份工作就在资料室归集资料，入伍之后养成了积累的习惯，一套《大众电影》杂志，从1950年的创刊号开始收藏至今一期不少，每个年龄段的参观者都能找到自己熟悉的电影明星。平时的电影票、公园门票等全部分门别类留存，女儿一出生就建立了档案……1994年开始，陆续整理家里的老物件，经过几十年的搜集补充，崔兆森把爱好做成了家庭博物馆。

全国政协常委、山东大学《文史哲》杂志主编王学典教授评价说：“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，最终将一个平常人家的故事谱成一曲家庭传奇。”“他以他的用心与坚持，通过个人记录、个人档案、个人收藏，对逝去的历史实施了抢救，为时代变迁留下了一份生动的记录，留下了宏大历史的私人切面。”

在博物馆显眼的入口处，摆放着一张八仙桌，旁边两把椅子，后面的条几上摆着花瓶、镜子，中间的钟表已经停摆。崔兆森说：“东边花瓶西边镜子，寓意东平西静，生活平平静静，中间一个钟，寓意终生平安。这套老家具是父母结婚时置办的。打记事起，我家里就是这么布置的，这也是上个世纪典型的家庭布局。”

旁边放着几把老式暖壶，崔兆森拿起一把绿皮镂空暖壶，讲起了四十年前的循环经济。



崔兆森在讲述老物件背后的故事。看视频请扫描下方二维码。



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，他们家开始用这种铁皮暖壶。这是济南自行车链条厂、搪瓷厂、保温瓶厂三家合作制造的，外壳用生产自行车链条的下脚料焊接而成，然后挂了一层搪瓷，链条钢硬度强，满身8字形镂空恰好减轻了重量，而且不易存水，坚固实用，堪称那个时代废物二次利用的一个经典。

“最受欢迎的还是上海暖壶，那个时候结婚送礼，不外乎脸盆、镜子、被面、枕头、暖壶这些东西，暖壶最受欢迎。我在安徽蚌埠当兵时，经常买抢手的新式上海暖壶回来送人，最多一次买回来8个，妹妹结婚时用的暖壶都是我捎回来的。”崔兆森说，现在随着饮水机、净水器的普及，暖壶早已淡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。

针线筐旁边的一把老熨斗见证了凭票裁布缝衣的紧巴日子，以及“新三年旧三年，缝缝补补又三年”的艰苦岁月。

## 坛子是“冰箱”

厉行勤俭节约，从来都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，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更是如此。在崔兆森的家庭博物馆里，有的碗带着一排“铜子”，也就是修补瓷器的金属钉。“我们小的时候，吃饭的盘子、碗只有在逢年过节才置办，算是重要家什。如果谁家孩子不小心摔了碗，真是摊上事儿了，后果很严重，下顿饭别吃了！并不是吓唬孩子，因为家里确实没有多余的碗。”崔兆森说，那时候都用粗笨重的陶碗瓷盆，摔了碗，只要碎片还能对上碴儿，通常就要铜子继续用。“铜盆，铜碗，铜大缸，铜坏了旧缸赔新缸。”在老济南街头，铜匠招揽生意的声音能传出几条街。

“听到这个吆喝声，我母亲就把平时收在角落里的破碎家什拿出来修补。最便宜的铁铜子，补一个两分钱。现在的年轻人很难相信，这些手艺人靠一个金钢钻和金属钉，不用任何黏合剂，就能把四分五裂的瓷器严丝合缝地修补好。那个时候，这种生意很好干，铜匠经常在一条街上一忙活就是半天。”崔兆森感慨，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，后来锅碗瓢盆坏了就买新的，铜瓷的活计逐渐没落了，那些手艺人也消失了。

在崔兆森的博物馆里，有一只不起眼的坛子，在上个世纪，它在几十年里担当着冰箱的角色。

1962年，因为母亲生病做了手术，医生叮嘱每天早晨吃个鸡蛋。那时，市面上买不到新鲜鸡蛋，只有“石灰水鸡蛋”（把鸡蛋放在石灰水里泡过，碳酸钙会堵住蛋壳上的气孔，延长保存时间），而且还必须凭票购买，蛋黄基本上都是散的。“我们在院子里养了一只小母鸡，母亲能吃到新鲜的鸡蛋了，产量增加之后，母亲就把鸡蛋攒在青花瓷坛子里，覆盖上一层小米，没小米时到对门木匠铺里搓一簸箕锯末、刨花，盖上保鲜、防苍蝇。”崔兆森说，母亲去世后这个坛子继续冬天腌咸菜、夏天存鸡蛋，一直没舍得扔，每当看到它，眼前就浮现出母亲存鸡蛋的身影。

1986年10月9日，崔兆森家花了近千元买回第一台电冰箱，这在当时算是最大的支出。有了冰箱，食物的保鲜、存储再也不是问题。又过了20年，这台冰箱也“退役”了，换上了双开门的大冰箱。这个用了几十年的坛子和老冰箱，本来不属于同一个年代，因为功能类似，被陈列在一起，储藏着亲情，传递着变迁。

家庭博物馆角落里三个有故事的行李箱，见证了崔家三代人的奋斗和梦想。最老的皮匣是崔兆森父亲的，作为当年渤海军区的老八路，常年为部队采购给养，这只皮匣装过金条、元宝、首饰、药品，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出生入死。第二个柳条包是崔兆森哥哥的，1964年上映的纪录片《军垦战歌》让23岁的大哥毅然报名参加建设大西北，用这个柳条编织的行李箱，装下全部家当和母亲的牵挂，坐上远赴甘肃张掖的火车。第三个是拉杆箱，1994年崔兆森的女儿考上了北京广播学院，那时刚开始流行拉杆箱，“我去买了一个，给孩子装行李，刚到北京火车站，轮子掉了一个。那个时候，车站还没有便民行李推车，我一咬牙，把几十斤重的大箱子扛到了肩上。那时国内的拉杆箱制造技术刚起步，掉轮子很常见。1999年，女儿出国时，行李箱就有了万向轮的设计，更方便了。”

## 50年日志“大数据”

每天写日志，是崔兆森坚持了50年的习惯。每天早饭后，第一件事就是写日志。他

扎根荒山，坵垦林场三代人接力造林——

# 五十余载“造绿路”

□ 本报记者 刘磊  
本报通讯员 吕鑫森 张伟

又是一个雨季，坵垦林场护林员们又忙了起来。瓢泼大雨中，杨实刚带领一队护林员，背着树苗，向山上进发。脚下是父辈们铺就的羊肠小道，心中是守护绿色的大梦想，护林员们迈出的每一步都坚定无比。

## 6000多亩荒山成林海

20世纪60年代，淄博市临淄区西部的荒山上，第一代坵垦林场的护林员种下了一批幼小的侧柏树苗。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，6383亩侧柏犹如一片林海为临淄西部的化工区绘就出一片绿意和生机。

沧海桑田。改变这一切的，是坵垦林场三代护林人的坚守。

今年杨实刚已经58岁，他的父亲杨光源是坵垦林场第一批护林员。1979年，杨实刚继承了父亲的“班”，在他眼里，护林员工作“既能让一方百姓受益，还能造福子孙后代”。

在杨实刚的带领下，记者走进坵垦林场，仿佛置身于林的海洋，枝繁叶茂，耸入云天；鸟鸣山愈静，蝉鸣林更幽。

“我每天都得上山巡查，41年来，这里的每块石头我都熟悉，对这里的条条小道、片片树林都有很深的感情。”杨实刚抱着父亲种下的一棵老树，深有感慨。

儿时，还在博山老家念书的杨实刚，经常趁着周末自己坐车到金岭镇，再步行一个小时，到父亲工作的林场。那时的林场，没水没电，光秃秃的没有一棵树，仅有一些稀疏的杂草。“交通不便、环境艰苦”是他对父亲工作环境的印象。

为了种树，父亲杨光源不知磨破了多少双鞋，用坏了多少把铁锹。那个年代，卖一只鸡的钱也买不了一把铁锹。“养鸡是为了生活，而父亲却把鸡卖了换铁锹，为此，母亲还跟父亲怄过气。”杨实刚回忆。



杨实刚父女俩眺望远方，“绿色梦”还在继续。

担挑上山的，扁担用断了多少根、箩筐用坏了多少个，可能他们也记不清了。”杨实刚说。

严酷的自然条件，挡不住他们的建设热情。再难，树，都得一棵棵种出来。

“没有交通工具，山上的路也是父辈们一步步走出的狭窄小道，父亲每天早上5点起床，背上一壶开水，带上点干粮，在天还麻麻亮时便背着树苗摸索着上山，一干就是一整天。”杨实刚说，为了防止周边村民的牛羊把小树苗啃了，父亲每天都要巡山，一个山头一个山头地转，一天下来，至少要走三十多公里山路。

山上本无路，走得多了也便成了路。林场一带交通条件极其不便，最初巡山护林只能靠两条腿。荒山上荆棘灌木丛生，陡峭的地方行走都不容易，何况背着树苗，护林员随时面临从坡上滑下去的风险。起先，他们用镐刨出台阶，后来被大雨冲毁，他们便从山上收集各种石头和废砖头，垒出一条条羊肠小道。

不畏艰难，垦荒植树。在杨实刚看来，父辈们用青春和热血在这片荒山秃岭上书写着动人的故事。

## 瓢泼大雨里抢种树苗

挑担上山的，扁担用断了多少根、箩筐用坏了多少个，可能他们也记不清了。”杨实刚说。

20世纪70年代末，杨实刚从老家去林场的次数越来越多，有时索性在林场与父亲住上几天，一来二去，他开始协助父亲挖树坑、运土、植树，18岁那年，杨实刚正式从父亲手里接过接力棒，开始守护父辈们栽种下的林子，成为了第二代植树人。

“一镐下去，火星四溅。”虽对林场的艰苦环境早有心理准备，可真正自己独自上山种树的杨实刚还是被震惊了。林场地貌碎石居多，不适宜栽种椿树、榆树，却适合栽植刺槐、侧柏等树种，尤其是在雨中栽植侧柏成活率更高。于是，一有雨雪天气，杨实刚和大伙儿就自觉往山上赶，顶风冒雨植树造林。

杨实刚说，为了种好山里的树直接住在山上，一住就是两三个月，最苦的是没电，为了省下钱来买树苗，连蜡烛也舍不得买。烧干树枝生火做饭，烟熏火燎在山上生活了好几年。为了护林，他放弃了外出打工能换来的更好生活；为了护林，他在山上自己学会了生火做饭，和面、蒸馒头、熬菜样样拿手；为了护林，他把年轻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抛在山下，却把一棵棵树苗当成自己的孩子用心呵护……

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，两代林场人靠着惊人的毅力将一棵棵树苗扛上山。由于干

旱，栽下去的树苗成活率不高。第二年，他们又在原坑上重新补栽。就这样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，种了栽，栽了种，不断扩大栽树面积。

20世纪80年代初，护林员们的双腿才被解放出来，开始骑着自行车上山巡护，后来，林场修了路，摩托车、电动车、消防车、护林敞篷车也上了山……“最开始的工资也就几十块钱，朋友都说我是山里人，随着国家对生态环境越来越重视，林场的条件也在逐渐变好，现在到外面打工的人都羡慕我的工作。”说起这些年的变化，“杨实刚们”感触颇深。

为了守好这片山林，杨实刚干脆把家安在了林场。40多个寒来暑往，一年365个日日夜夜，他从未间断过护林工作。林场土质贫瘠且薄，没办法浇水，只能趁着每年的雨季多种些树。瓢泼大雨中抢种树苗是他们工作的常态。冬季防火、雨季造林、森林巡护，单调乏味的工作，杨实刚却甘之如饴。

每年的春节和清明，是林场防火的关键期。在防火高发期，杨实刚常常是一个馒头、几块咸菜就进山了。而在寒时节巡山时，头发结冰是常有的事。伴着凛冽的寒风嚼着馒头，踏着湿滑的积雪去巡山也成为护林员们的“家常便饭”。为了看守好林区树木，几十年来，杨实刚都没顾得上回博山老家给父亲扫墓。“再苦、再累都不能松劲，父亲在看着我呢！”

“这些年来，树已成我生命的一部分。我舍不得、放不下这片林子，我会一直坚持下去，把林地维护好、看管好，一直干到我不动的那天……”巡山的时候，望着一排排笔直的侧柏，杨实刚想起了自己的父亲，他说，要对得起父辈们的付出和当地的老百姓。

## 林场来了第三代

造林绿化是功在当代、利在千秋的事业，要一年接着一年干，一代接着一代干，撸起袖子加油干。这也是坵垦林场人奋斗精神的真实写照。

“父辈们种下的第一批侧柏，现在已经有30公分粗了……”每次巡山，望着延绵的群山和碧绿的林海，杨实刚的心里都满是感慨和自豪。他把年轻的林场人栽下的树、修出的路当作自己的“娃儿”，看到树被烧了、砍了，都会心疼好一阵子。

如今，“杨实刚们”陆续面临退休，在他

把时代和人生，浓缩在1500多万字的日记里。

“1970年12月22日，我响应号召参军入伍，从当兵的那天起，决定每天写日记，记录军旅生涯的点点滴滴。”如今算下来，已经写了半个世纪。

“一种习惯坚持了这么多年，不写就觉得浑身不得劲。记下平凡生活的细枝末节，也记下家国变迁，经历岁月的积淀，竟然也串联成一部跨越半个世纪的生活画卷。20世纪80年代我家有了电视机、电冰箱；90年代装上了固定电话，用上了BP机、手机，开始出国旅行……”或已泛黄或还簇新的日志本摞起来已经两米多高。2002年12月22日，崔兆森被中央电视台《中国日记》节目邀请到北京参加节目录制。

2006年，已近60岁的崔兆森开始写两个版本的日志，除了手写之外，还尝试用“二指禅”功夫在电脑上写电子版日志。2017年，他想要原来的所有日志做成电子版，统计出来的字数出乎意料：竟有1500多万字！攒了几十年的文字，存入一张指甲大小的8G存储卡里，不过占用了2.5%的容量，科技的进步让崔兆森惊叹不已。“回首过去的时光，让我更加珍惜眼前的每一天，有生之年还会一直记录下去。”

在崔兆森50年的日记里，有很多老百姓的生活“大数据”。比如每月的工资，见证了广大职工家庭的收入变化，实现了从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。

1965年的时候，全家5口人靠父亲每月57元的工资生活，处处精打细算，勉强度日。

“1971年到1974年，我在部队每月的津贴分别是6元、7元、8元、10元。1974年8月提干之后每月52元工资，1979年12月，正连职22级，涨到了60元。那个时候全家已有十口人，六个人挣工资，每月总收入380多元，人均接近40块钱，在当时算是比较高的了。”崔兆森说，在改革开放初期，除了基本工资外，还有一些带有时代特色的补贴：副食补贴、粮食补贴、肉食补贴……那个时候吃饭是每家每户头等大事，吃饭支出占比相当高，他和哥哥发了工资就全部交给父亲，作为整个大家庭的伙食费。

他们家还有过两次外债，1982年由于父亲手术、岳父去世，出现了“财政赤字”，为此他把孩子的独生子女保健费取出来应急。1988年，因为妻子得到了一张21寸彩色电视机票，这在当时可是让多少人眼热的紧俏指标，崔兆森拿出了所有存款还不够，又借了一些钱，在那年的最后一天交上4020元，买回了大彩电。

在崔兆森的印象中，1994年开始，工资一路“高歌猛进”，年初还是392元，年末就到了800元。2000年提前退休时涨到2114元。如今，他的退休工资在万元左右。从正式领52元的工资算起，46年间，崔兆森的工资涨了接近200倍！这些真实的大数据背后，是握在手里的真金白银，是生活水平的飞速提高。“每次想起这些，我就感恩自己生活在这个时代，感恩脚下这片热土！”

们的影响下，越来越多的孙辈们投身到护林播绿第一线。四年前，杨实刚的女儿杨丽辞掉自己原来的工作也来到林场，接过祖辈、父辈的责任，为林场建设奉献自己的青春。

“刚开始不想干，因为感觉这对于年轻人来说太枯燥。”起初，杨丽对这份工作并不满意，但随着一次次巡山、一次次浇灌，看着面前满眼绿意、清凉舒适的林场，杨丽渐渐明白了爷爷和父亲的责任与坚守。

“爷爷和父亲在这片山上付出的心血太多了，他们用青春和热血在这里栽的树，不能成功尽善。”为了不让长辈失望，不让两代人的心血荒废，更为了守护这一片绿意继续造福后代，杨丽也开始踏着前人的脚印，深一脚浅一脚地跟着父亲巡山、护树。

“防火工作是林场的命脉。现在林场的条件好了、环境美了，人们都喜欢利用周末假期来山里游玩，增加了护林防火工作的压力。”为提高大家的防火意识，杨丽和同事们不仅要走村串户进行宣传，还需在主要路口悬挂宣传横幅和宣传牌。特别在春节、清明等重要节假日期间，杨丽主动放弃休假带领防火队员，坚守岗位，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。

“爷爷、父亲在林场干了一辈子，如今，我接过父亲的接力棒，将继续扎根林业、服务林业、献身林业。”杨丽说，“现在整个山体都绿起来了，小树苗的存活率达到90%以上，当年种的树现在都长成片了。”

不畏艰难，愈挫愈勇。一代代林场人顽强地扎下根来，种下一棵棵幼苗，种下恢复绿水青山的理想和信念。

1993年，坵垦林场被确定为省级生态公益林地。同年，临淄区永安森林公园被山东省林业厅批准成立，且定为省级森林公园。

50多年绿色接力棒代代传承，半个多世纪“困难地”里执着坚守。如今，坵垦林场管辖林地6383亩，所辖灵山、中山、大山、王佐山、莲花山等片区，24个山头，森林覆盖率达到92%。

“爸，你看这片林子是你那代人打下的江山，那片，是我们打下的江山……”采访最后，杨丽笑着向记者描绘着多年后，自己带年后的父亲再看林场时的景象。

岁月无声，大山有情。关于绿色的梦想，正在一代代坵垦林场人的追求中变成现实……